

全球化趨勢中勞動者之人權保障

林佳和*

前言：國際社會人權三面向 - 自由自主、基本需求、分配正義

壹、 基本界說與進路選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

貳、 理解的開始：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與形式

一、 全球經濟結構的重組與發展

二、 聚焦：所謂的排他型國際貿易、產業結構的不均衡發展

參、 經濟全球化的勞動關係面貌：去管制為核心

肆、 回到問題意識：全球勞動者可能共通的「人權趨勢」？ - 代結語

因為全球化的形成而使其生活全然改觀的人們，應該有權利參與對於全球化的辯論，並且有權利知道，究竟是誰，在過去的什麼時候，曾經作出了什麼決定…

200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顧問 Joseph Stiglitz

*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勞動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國際社會人權三面向—自由自主、基本需求、分配正義

也許這真的不是 – 甚至同樣對於台灣的社會與學術領域而言 - 陌生而難解的問題了：全球化趨勢中勞動者之人權保障，早已是「全球化言談」顯學（Diskurs und Öffentlichkeit um Globalisierung）中，被廣泛的討論與提醒之問題關聯，不論是正面或是負面；讓我們看看紐約時報主筆、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 Paul Krugman 所說的：被剝削總比失業好…沒有全球化帶來的貿易自由，第三世界國家更永無翻生機會…在這樣的言談氛圍中，在片面而偏頗的「國際貿易交往帶來更便宜商品」論點之外，經濟全球化總算找到它些許道德光環的一面。負面的評價就更是眾口鑠金了，只要看看法國著名媒體 *LE Monde diplomatique* 所蒐集的「專家資訊」便可得知：加入工會、協商並締結團體協約、罷工，這些傳統的所謂勞動者基本權利，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沒有比現在更差的時刻了…不論在世界的那一角落，工會運動都是節節敗退，在眾多令人頭痛的古老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工會的新挑戰卻早已兵臨城下¹。

既然如此，這一篇「全球化之下的人權保障與人才共享研討會」中，專注於「全球化趨勢與人權保障」議題的論文，究竟應該談些什麼呢？著實令作者感到不易。或許容許我跳脫傳統上直接引介與面對「究竟勞動者受了什麼委屈」的基本論述基調，先將焦點選擇擺在「國際人權」的語意意涵上吧。就像德國哲學家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寄望之「國際/全球市民社會」所掀起的哲學討論熱潮²，學者們不斷的問：在「人權」之道德倫理基礎，國家間貿易保護主義的包裝掩飾，有別於國民國家「憲法基本權」之無國家執行權力壟斷為依靠的「國際人權海市蜃樓」等等，在這些有關國際人權的衝突性討論之外³，從哲學的角度出發，識者們還應該看到什麼更為本質的重要面向呢？依循著典型哲學式的標準問法，問題無疑是：何謂國際人權？它的具體內涵究竟是什麼？如果再聚焦於勞動相關領域的所謂社會人權（soziale Menschenrechte），哲學家們最感興趣的問題無異是：這些社會人權的形成理由、內容與範圍⁴，究竟應該是什麼？這裡並

¹ *LE Monde diplomatique*(Hg.), *L'Atlas du Monde diplomatique*, Paris 2003; 筆者參照的是德文譯本 *Atlas der Globalisierung*, Berlin 2003, siehe nur S. 72f.

² 請參閱 Habermas 1999 年以來的諸多著作，例如 *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 Ffm. 1999、*Zeit der Übergänge*, Ffm., 2001。

³ 例如從 Brunkhorst/Köhler/Lutz-Bachmann 所編輯之《主張人權的權利》(Recht auf Menschenrechte. Menschenrechte, Demokrati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Ffm. 1999) 專書中，吾人便可看到這一「全球化人權」問題的多重面向。

⁴ 請參閱一本集合歐陸眾多知名哲學家所撰寫之「人權的哲學」專書，其中即以此為探討諸多不同面向人權的共通點，以便聚集不同進路的討論於同一焦點；siehe Gosepath/Lohmann, *Philosophie der Menschrechte*, S. 14ff.

不是專門討論人權所涉及之哲學思維的適當場所，就讓我們直接聯繫至歐陸學界分析相關之社會人權的脈絡中，眾所公認的三項核心客體，而無疑的，這三項客體均涉及所必須關注的人權之形成理由、內容與範圍，貫穿其中；這三項客體便是：自由自主、基本需求、分配正義⁵。

簡單的說，社會人權涉及到不同的三個面向與領域，或許可以用另外的角度來說：三項存在著「隱約」上下層級與不同階段關係的面向。首先是自由與自主，這當然是源自於一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產物，強調每個人皆有主張並行使自由的權利，歷史上從政治與經濟領域開始作不盡然是線性式的發展；社會權利在「自由」脈絡中的定位，主要便是德國憲法釋義學所談之典型的「社會國自我思維」（Selbstverständnis des Sozialstaats）⁶：滿足人民的社會需求，目的就在於促進主體得以平等的行使自由權，同時保有自我的個人與政治自主。其次，「作為人之主體所應享有之最低基本生活需求」，亦即所謂「人類學上的基本需求」（anthropologische Grundbedürfnisse），此亦為憲法學上之社會國原則所專注之焦點：「作為一個有尊嚴之人之起碼與最低生存價值與需要」，亦即最為傳統與古典之社會人權的指涉所在⁷；此一在國內被廣泛稱之為「社會權」的保障客體，自然毫無疑問。最後則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平等分配」問題，換言之，所涉及的並

⁵ 最為簡潔與分析各家學說結論，所整合出之此三項社會人權觀照客體，請參閱 Gosepath, Zu Begründungen sozialer Menschenrechte, in: dersl./Lohmann, ebenda, S. 146ff.。

⁶ 此便為德國基本權理論所建構之所謂「基本權行使之事實要件」；如同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的名言：「國家建立於自己所無法以自由之名保障的要件之上」，換言之，自由基本權的行使也必須仰賴於自由基本權之效力所無法涵括的事實要件之上，基本權從來都不是自我完整而封閉的、得以全盤規制國民社會生活的價值系統，而只是一需要填補的框架秩序，是以在憲法釋義學體系上，「基本權」與「基本權行使之事實要件」早已涇渭分明，雖然不是指涉完全同一，但無疑的，這樣兩組概念的區分，相當程度的緩和了法治國與社會國原則的衝突，因為顯然的，社會國原則保障的無疑就是「行使法治國核心自由權所需之事實上要件」：它要求國家為著國民的自由基本權，必須努力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維護社會安全，以克服憲法所賦予之自由權與應予保障之自由權行使事實要件的落差。相關討論請參閱 Böckenförde, NJW 1974, 2098; dersl.,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S. 69。

⁷ 以 Rolf Stober 的整理為例，社會國原則大致涵括下列幾項的政策內涵：(1) 經濟上生存最低限制的保障；(2) 排除經濟上的急迫狀態；(3) 國家的職業介紹與就業服務；(4) 經濟競爭秩序的維繫；(5) 防止壟斷或寡占市場的不正競爭秩序；(6) 反托拉斯性質的排除特定之市場力量；(7) 保障勞動者之廠場共同決定權；(8) 促進經濟與職業領域的自我管理（例如公會與工會）；(9) 經濟上行政任務的委託私人履行；(10) 保護經濟上之弱者與受歧視者；(11) 消費者保護；(12) 扶助經濟上的中產階級；(13) 以價格或費率之訂定，或藉由特定的市場規則以影響市場運行；(14) 經濟生活在特定規範的框架下形成；(15) 限制契約自由（特別是在經濟法的領域）；(16) 國家促進經濟成長之委託；(17) 經濟扶助或補貼；(18) 控制及監督經濟行為與過程；(19) 保障糧食與其他民生必需品的供應；(20) 符合社會公平需求的調控經濟活動；(21) 努力達成充分就業；(22) 普遍之財政與經濟計畫；(23) 維繫貨幣的穩定；(24) 保護勞動力之免受過度利用與剝削；(25) 運用總體經濟的調控機制以防堵與克服經濟危機；(26) 強化個人之經濟自我責任與經濟自助的能力；(27) 經濟秩序失靈時之國家介入；(28) 保護國民免受經濟行為領域所生之危害；(29) 防止、減輕或補償不同經濟區域與產業所生之落差與緊張關係；(30) 節省原料與能源的浪費，維繫與保護下一世代的經濟生活基礎；dazu Stober, GewArch 1988, 151。從其中可以看出，許多都與「人民之最低基本生活需求」息息相關。

非自由自主或基本生活需求的問題，這兩個層次的問題甚至可能已經完全滿足與解決；這個面向所觀照的，無非是在「個人擁有自主」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無虞」的條件下，社會成員主體如何能夠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更社會的（sozial）平等分配社會財富。當然，這個部分的問題意識並不令人陌生，從 John Rawls 的正義論以降，近期政治哲學的論述均集中圍繞於此，特別是在當代社會情境早已遠離所謂早期資本主義的「赤裸剝削」的階段，甚至步入諸如西北歐國家一般之社會民主之後，此一面向的社會人權問題，無疑成為最重要、甚至是幾近唯一的關注辨正焦點：基於社會連帶，或甚至本於社會團結與和諧，社會成員如何能聯繫／不聯繫其貢獻與能力的，去參與整體社會的共同財富與資源？無疑的，二次大戰後數十年的政治哲學討論告訴我們，這可能已變為當代的唯一、至少是最重要的「正義」問題。當然，也應是作為「人權」問題的應有關照對象。

社會人權的三個領域與面向，擺放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與條件下，其呈現之面貌就更為明顯了；且讓我們先以一素樸而直覺式的觀察開始：顯然，相較於不同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階段，或用管制學派（Regulationsschule）的標準術語來說：在彼此間歧異甚鉅的「積累模型」與「管制方式」中⁸，或再用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中心-邊陲」座標來看待不同國家間的巨大差距，吾人皆可清楚的看出：想要理出一個清晰而某個程度一致的各國「社會人權」面貌，其實是難以作到的，假如不是一項不可能之任務的話。易言之，在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在差距甚大的國民與個體經濟發展型態下，既使它們同樣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卻又尤然呈現截然不同的現象，吾人如何得以爬梳一清楚的「紅線」，尋找出何謂「全球化趨勢下的勞動者人權保障」問題呢？基於此一問題意識的出發點，同樣而不能免俗的，本文還是試圖先從一般對於相關問題的論述脈絡出發，分析此一具體面向「學術眼光中的形貌」，接下來再回到自己的問題意識本身，試著面對它，企圖找出一或許僅存的「貫穿紅線」：究竟從一普遍的層次來說，經濟全球化給全世界的勞動者，可能「都同樣的帶來了什麼影響」？

壹、基本界說與進路選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

在近十餘年來，全球化〈Globalisierung, globalization〉大概是各學術領域及社會議題焦點的顯學了，談到任何領域的發展，全球化無疑都是扮演重要制約功能的背景及條件，就一個語意學上來說是意涵「一種正在運動中的發展過程」的

⁸ 管制學派最重要的概念，便是「積累模式」，指某一時期資本積累的形式總稱，以及「管制方式」，意指使資本得以穩定積累、符合資本積累模式的所有國家或非國家的規範、制度、組織形式、社會網絡與行為模式的總稱；相關討論請參見 Demirović/Krebs/Sabrowski, Hegemonie und Staat, S. 238。

名詞而言，全球化雖不是全球性或全球主義〈Globalität oder Globalismus〉之類的狀態條件或純粹意識型態主張，但弔詭的是，全球化在溝通語彙中卻包含著全部的意義：全球化既可能只是一個未來發展方向不見得線性的過程，它卻也可能指涉一些已然形成的歷史發展結果及條件，更可能只是一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動的計畫（Projekt）⁹，但是，在一語意不清的情況之下，一般對全球化名詞的運用常在不同的問題關聯下，混用著所有不同的意涵，所以，對全球化的定義及理論詮釋也就常顯得問題重重，混淆不清了¹⁰。本文所要談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經濟領域上的全球化之發展及現象，因為新興的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的產生，也就是它在地域意義上真正擺脫過去的國際化面貌，開始走向全球化層次（最明顯的是國民國家經濟主權的質變），整個區域及全球層次的經濟關係網絡，呈現前所未有的擴張、廣度與穩定性，它所連帶引起的資本與勞動關係的轉變，乃至於國民國家內一般社會、政治、文化等條件的急遽變遷，都是當代國家學所關注的問題。全球化事實上已非純是理論上或意識型態上的描述，「經濟的全球化」已經是一經驗的過程、社會的現實¹¹。雖然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或全球主義，但它作為學術或通俗名詞本身，已經具有 John Holloway 所說的「全盤的總體性」（globale Totalität）：這是一雙關語，指涉不是全球的宰制，而是全球化作為主宰所有意識及理論活動的客觀狀態¹²。

既然，就如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的：所有哲學問題都是定義問題；討論全球化，同樣碰到這個論述的重大障礙。就讓作者直接作選擇：新自由主義理論到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末期，特別是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世界國際資本分工體系重組、科技發展步入嶄新階段之後，不論其理論或實踐，都走向一個全新的時代：全球化，換言之，「空間地域」意涵的改變而移向全球場域，使得新自由主義，有了雖非全新，但卻是不同時空脈絡下的發展面貌¹³。簡單的說，市場經濟秩序、供給導向的經濟政策、去除有礙市場秩序的管制形式（例如勞動市場）等新自由主義的意涵，皆因吾人身處的環境與條件已經脫離國民國家（Nationalstaat）範疇與國際化時代，換言之：走入經濟全球化的時空之下，因而有了不同的論述基礎、整體理論與實踐的秩序結構脈絡，甚至是正當性指涉或其作為意識形態之施

⁹ 這是 Hirsch 的一貫看法：全球化並非無可避免或甚至必然降臨的發展趨勢，而毋寧是一資本所推動的政治經濟計畫，運用之以為許多衝突與對立中貫徹己方之利益；dazu Hirsch, Der nationale Wettbewerbsstaat, S. 9, 104ff. Lompe 亦批評道：當代的全球化論述，無疑是一現實利益導向之社會對立衝突的結果，重點不再是客觀的經濟規律或世界市場的主宰，而轉變為一種以利益為基礎之意識之爭；siehe dersl., Neue Dimensionen politischer Macht aufgrund ökonomischer Positionen, S. 157。

¹⁰ 關於全球化定義上的這個問題可參閱 Beck, Was ist Globalisierung? S. 26, 196; Albrow,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 131ff.

¹¹ Albrow,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 98; Alvater, Ort und Zeit des Politischen, S. 83.

¹² Holloway, PROKLA 1993, 18f.

¹³ 相同的看法如 Lipietz, Nach dem Ende des Goldenen Zeitalters, S. 176f.

壓作用；例如 Robert Misik 便以此觀點描述全球化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加持作用」：重點不在於事實層面上是否確實出現全球化革命，因之催促著人們重新思索及重組（Umcodierung）傳統的政治概念，而是全球化將新自由主義的想法，變為人們內在的當然信仰與內化的自我壓迫，例如：社會福利國必須加以反對、國際競爭力勝於一切¹⁴。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及實踐，在全球化的嶄新框架下，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形式與面貌，雖然其主要的理論主軸同樣未變。因此，本文將分析進路侷限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us）下的全球化，同時將橫軸主要劃定於經濟之領域；讓我們先行觀察，究竟經濟全球化帶來了那些質量變。

貳、理解的開始：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與形式

一、全球經濟結構的重組與發展

從一般的語意指涉來說，貿易、生產以及特別是金融市場，已無視國家間的界限，成為一跨越全球的活動，這就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全球化，或是經濟的全球化¹⁵。在這個運用地域空間概念「全球」（global）的意涵中，「脫逸出原有國民國家之主權界限，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法律領域及主權」，甚而形成一世界各地區相互發展形成一全球化網絡關係，換言之：「全球性的地域空間」是一個相當核心的指涉特徵¹⁶。將焦點擺在全球資本分工體系來看的話，所謂經濟全球化的最主要現象，便是以全球為導向的企業，即所謂的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e Unternehmen, TNCs）或跨國企業集團（transnationale Konzerne, TNKs）的成為主要全球行動者 – 相對於昔日國際化時代的仍以國民國家為主角 – 。跨國企業在世界各地進行研究發展、生產、並且行銷它的產品，跨國企業主要是以分工的方式，也就是將位於不同國家與區域內的不同生產據點（所謂的 Standort） – 換言之，以「全球」為其空間場域的生產體系 – ，在其得以整合之各式不同供給形式的條件下，彼此連繫網絡起來共同進行生產，這與過去經濟國際化時代的「單一國家為最終端的產品生產，然後行銷國際」的國際貿易形式大不相同。此類所謂的「跨國之行動者」（transnationale Akteure） – Ulrich Beck 的用語 – ，不論其權力機會、決定傾向、認同、乃至各生活領域的網絡，都已超出傳統國民國家的主權所及範疇；這便是所謂的經濟全球化¹⁷。從比較抽象的層次來描繪的話：全球化之所以不同於國際化，主要係因地區性、全球化的相互關係網絡，不論穩定

¹⁴ Misik, Mythos Weltmarkt, S. 121.

¹⁵ Kohler-Koch 將之稱為「所有實體與非實體交換關係的失去界限（Entgrenzung）」；diesl., Politische Unverträglichkeit von Globalisierung, S. 86f.。

¹⁶ Beck, Was ist Globalisierung? S. 28f.; Alvater, Ort und Zeit des Politischen, S. 83; Giddens, Konsequenz der Moderne, S. 85.

¹⁷ Beck, ebenda.

性或廣度密度，都有了截然不同於國際化時代的面貌；在此新的國際資本分工體系中，世界各生產據點與網絡的相互依賴性提高，相對的 – 接下來有關國家的論述將進一步提到 –，內國經濟指揮及管控的密度隨之降低¹⁸。另一個較為人所忽視、但顯然深具結構性意義的是：既以跨國企業為全球化的主要行動者，搭配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導向之政策傾向，全球化在意識推衍上，遂逐漸有個體經濟的濃厚傾向 – 雖然總體經濟的觀點並不少見 –，這再討論有關勞動關係之去管制時，其實是一相當重要的脈絡¹⁹。

促成從經濟的國際化走向跨國企業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依學理上的分析，得助於下列技術性條件之配合：

- 新的資訊及溝通科技，如情報衛星、網際網路、企業網路，這些新技術使得資訊得以便宜而極快速的傳遞到世界任一角落；
- 排除國家關稅壁壘，使國際貨物及資本流通更形簡便之國際協定或區域、甚至全球性貿易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 WTO）紛紛出現；
- 各國於政治上決定將金融市場自由化，特別是外匯、股票市場的全然向全球開放 – 手段上是藉由戰後形成之世界性經濟制度（如 Bretton Woods 固定外匯協定）的消滅²⁰；
- 運輸成本的日益減少；

換言之，科技的進步、地緣活動領域的擴大、國際貿易互動關係的頻繁、全球金融市場的連結、跨國企業力量的急速成長，乃至最重要的：國民國家政治力的配合推動 – 包括國內與國外²¹ –，均是催化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原因²²。跨國企業生產據點之全球性分佈，也就是選擇座落於那一國家或區域，其主要目的在於開發銷售市場，亦或根據成本以及技術條件的考量散佈其生產網絡上的不同據點（所謂生產的枝節化 Fragmentierung der Produktion²³）；為了更接近市場，為了更快速滿足客戶的需求，國際性的企業不斷併購外國公司，或選擇在當地直接建立自己的企業。另一個可能的動機則是，為了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從事更便宜的生產，以獲取更佳的競爭優勢及更高的利潤，跨國企業選擇至其他國家及區域建立生產據點。

¹⁸ 特別強調這個面向的全球化理解，請見 Giddens, Konsequenz der Moderne, S. 99; Demirović, Die Transformation des Wohlfahrtsstaats, S. 93。

¹⁹ 這個向度的討論如 Germann/Rürup/Setzer,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S. 19f., 21。

²⁰ Chomsky/Dieterich, Globalisierung im Cyberspace, S. 29；此亦即學理上認全球化並非經濟國際化的必然發展方向，或甚至是經濟規律，而是國民國家推動結果之故。

²¹ 這裡所謂「向國內的推動」，主要便是歐洲新管制學派（所謂批判的管制學派 Kritische Regulationsschule）所談的所謂「後福特主義典範的貫徹」(nachfordistisches Paradigma) – 亦即新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在內國貫徹；siehe Jessop, Regulation und Politik, S. 245f.

²² Kohler-Koch 將之通稱為科技變遷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dazu diesl., Politische Unverträglichkeit von Globalisierung, S. 95。

²³ Albrow,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 207.

整理起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現象主要有下列幾項²⁴：

- 跨國企業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推動者及角色²⁵；
- 新的生產技術，特別是所謂的資訊與溝通科技的發達；
- 全球消費模式的逐漸趨向一致發展²⁶，此有利於跨國企業消費產品的全球市場的建立；
- 生活方式的逐漸趨向一致發展，特別是美國文化工業的進逼，使得各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生活方式的美國化；
- 資本的流通自由而迅速，國際金融市場的全球化，金融資本的積累脫離真實資本（Sachkapital）的積累，隨著國際信用體系的形成與擴張，金融資本越來越不是用來支持實際的貿易與生產投資，而是依循匯率的波動而運動，首要目標在於投機性的、短期獲取利息利益，而非從事生產，國家的逐步喪失利率及匯率主權是其原因，也是後果²⁷；
- 國際勞動力的流通，許多國家（特別是北美及歐洲）開放勞動力的自由流通，但多半限於高科技專業的勞動力；
- 國家與國家間貿易障礙的逐步消失，特別是在國際貿易組織成立後，不過當然，就商品與勞動市場而言，目前仍沒有所謂完全自由的國際、甚至全球性貿易²⁸。

二、聚焦：所謂的排他型國際貿易、產業結構的不均衡發展

在有關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上，經濟全球化的最重要現象與形式，其實是它呈現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的國際貿易型態，也就是說，目前以跨國企業、而非那一國家之國民/國籍企業為主體，所進行的國際貿易類型，相異於古典國際貿易模式（原料換取產品），以及替代性國際貿易模式（高價值產品換取低價值產品），是所謂之排他性的貿易模式（Verdrängungshandelmodell）²⁹。換言之，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的最大特徵，就是不同的內國企業或跨國企業生產相同或類似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排他性的競爭，例如美國波音與歐洲空中巴士

²⁴ Albrow,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 205

²⁵ 學說上稱之為所謂跨國企業的「定義力量」（Definitionsmacht）或「經濟決定主義」；dazu siehe Heilbronner, Wirtschaftliche Probleme einer post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S. 234。

²⁶ Vgl. Ritzer, Die McDonald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1997.

²⁷ Altavater/Mahnkopf, Gewerkschaften vor der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 S. 62f.。Amin 認為此為全球化時代經濟形式面的最重要現象：金融資本的操作與獲利優先於經濟成長、優先於物質生產系統的擴張；siehe dersl., Die Zukunft des Weltsystems, S. 53。

²⁸ 是以學者多分析認為，當今只有金融市場方屬真正的 globalization，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並非表示至少就其他的商品貿易市場來說，仍然停留於過去溝通語彙中的國際化時代，重點仍在於：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結構性特徵不同，而非單純的比較國際貿易量或對外投資行為之問題；dazu siehe Altavater/Mahnkopf, Gewerkschaften vor der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 S. 62ff.

²⁹ Jenner, Die arbeitslose Gesellschaft, S. 51, 83ff.

的民航機市場競爭，日本豐田與美國通用的汽車市場競爭，或甚至台灣與中國玩具或滑鼠之低附加價值產品的競爭等；這樣的競爭型態雖會使產品的售價相對降低，間接使人民的第二層購買力增加（同樣的貨幣量、相對較低的商品價格），但從事該項生產的勞動者卻會因排他性的競爭而失業，也就是根本的喪失第一層的購買力，結果成為這種排他型國際貿易的受害者 – 此即學理上所稱之「現代的經濟寄生主義」(moderner ökonomischer Parasitismus)：跨國企業產品的銷售，取決於某一國家國民的購買力，透過生產據點的選擇與操作，跨國企業不但對該購買力無貢獻，甚至對之有害³⁰。接下來，因全球化時代特有的生產據點結構因素，跨國企業可能不斷的移轉生產據點，不斷的在同一國家內的不同據點、不同國家的不同據點間，進行不斷的外移行動 – 不論是基於生產成本或開發銷售市場的考量，或甚至可能基於單純的威脅行動³¹ – ，使得各國的人民長久而言都成為潛伏的受害者。亦即，在跨國企業進行生產據點的選擇與移動上，第三世界及貿易新興國家並非以他們的低工資及惡劣的環境標準，威脅先進國家的勞動就業，而是跨國企業以此為手段，為了追求自己獲利所需的條件，同時威脅先進國家內的勞動人口的工資與生活標準，這便是經濟全球化之結構特徵 – 排他型國際貿易的問題所在。

下一項問題可能是：以跨國企業的角度來說，經濟全球化所代表的排他型貿易既是如此，那麼在國民國家的工業及就業結構，以及從全球資本分工體系來觀察，究竟那些會被納入全球資本及跨國企業的生產體系之內？而那些是跨國資本依據成本要素得隨時移動的生產，那些卻是不會因單純的成本考量而任意移動的生產？這將是觀察經濟全球化對國家內勞雇關係影響的最重要依據；依德國社會學家 Narr/Schubert 的說法，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勞動者就業結構的最大改變，就是所謂的「國家產業結構的不均衡發展」(Heterogenisierung nationaler Industriestrukturen)³²；跨國企業的主宰國際貿易，由於它不再是在某單一國家（如跨國企業的母國）進行終端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而是依一定的邏輯及成本或技術考量選擇不同國家及區域的生產據點，因此它已不再是過去傳統國際貿易中的所謂國家對國家、某國籍企業對某國籍企業的競爭關係，也就直接戳破所謂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錯誤說法³³。跨國企業依一定的邏輯選擇與淘汰某個國家的生產據點，所造成的後果，便是各國工業、產業結構的不均衡發展，也就是在同一國家內，被國際生產體系納入的部門，與被淘汰的部門成極端的不均衡發展，間

³⁰ Jenner, Die arbeitslose Gesellschaft, S. 129f., 132.; Junne, Leviathan 1979, 58f.

³¹ 例如南美洲國家曾出現之某跨國企業因員工意圖組織工會，以爭取較佳的工資與勞動條件，跨國企業遂決定犧牲所有投資，關廠他移，而且是移往同國的其他生產據點，因為該國政府保證該地的將來受僱者不會有意圖組織工會的行動；dazu siehe Narr/Schubert, Weltökonomie, S. 57ff.

³² Narr/Schubert, Weltökonomie, S. 57ff.

³³ Siehe Krugman, Jahrbuch Arbeit und Technik 1996, 37ff.

接造成許多接下來的問題。

吾人分析這項不均衡發展，得以下列之順序思索此結構性現象所造成之情況：

- 此應屬跨國企業及其策略聯盟所引發之結果；
- 所謂跨國企業的產品可以與其母國相連結的認同效果 (Identitätswirkung)，已經不復存在；
- 國民經濟的不均勻發展，整個國民國家變為跨國企業的行動據點，它結合不同國家的供應商，以追求生產力的提昇，最重要的是，在被國際生產體系接納整合的產業部門，與被淘汰的產業部門之間，其技術與生產力的差距越來越大，前者的獲利越來越高，越來越驚人，後者逐漸崩解，或同時淪入與成本低廉之國家作毀滅性或貧窮化競爭〈Ruin- oder Verarmungswettbewerb〉的情況³⁴；
- 所謂均衡的產業結構，是指國家工業所需的基本及必需給付都可以從當地的國民經濟體系中找出，而且其產品事實上亦供應該國隨後的生產過程，只要該產品不是終端產品或專供外銷之用；而這個所謂國家供應者與最終生產據點的脫節，主要原因便是跨國際的整合入全球的生產網絡之中；
- 全球化發展下的特殊結果是為：在高附加價值的生產部門之所謂高科技、高競爭優勢之餘，事實上是將其他的國家所有經濟活動都拖入全球的毀滅性競爭，因為有些經濟活動既是跨國生產網絡所不感興趣，也不透過這樣的方式進行生產（如台灣所稱的所謂傳統產業），因此他們就面臨截然不同的競爭條件：在不同的科技水準、資本密集及勞動條件下，進行相同產品的生產，各國的勞動力都過剩，他的競爭優勢往往只在價格的差異，因此企業必需汲汲於生產成本的降低與收益盈餘的擴張，結果：資本總是往工資最低、不在乎環境破壞、最輕視勞工權益的地方³⁵；
- 這個產業結構的不均勻發展，最主要的是高附加價值的高科技產品生產過程的枝節化，關鍵並非在於製造那些全球化的高競爭力獲勝國家，或全盤皆輸的落敗國家，而是參與這個跨國性生產網絡的國家同時獲益與遭殃，跨國企業加深了各國不均勻發展的程度，到了最後，每一國家能夠獲利的越來越少，其實，所有的國家都面臨崩盤，高科技的生產不會帶來國家國民經濟的成長，國家間不是全盤皆贏或輸，而是根本沒有贏家；
- 一個矛盾的現象是：越是主張自己在跨國際的競爭中佔有優勢的國家，也就是最具生產力的產品在其區域內製造的國家，通常也是這個不均勻發展及社

³⁴ Krugman, Jahrbuch Arbeit und Technik 1996, 56.

³⁵ Krugmann, Jahrbuch Arbeit und Technik 1996, 61ff.; dersl., Der Mythos vom globalen Wirtschaftskrieg, S.

會區隔化發展最激烈的國家；結果，就如許多勞動市場專家所畏懼的：全球的競爭、科技的發展、企業內組織的變革與縮減、部分工時職業型態的成長，導致工資的急速下滑，以及形成一有錢人與赤貧階級的二分國度。

在這裡，經濟全球化呈現出它最核心的國際資本分工秩序的重組結果：因為經濟全球化的指涉中所進行的是排他型的國際貿易，經過國際資本不同領域及面向（包括高科技及傳統產業的消費產品）的分工，也就是在不同國家與區域之不同生產據點的選擇與操作，製造出的問題是：國家內工業及就業結構的不均衡發展，少部分高科技產業勞動者被跨國資本及國際分工體系吸納入，所得與收入高，多數勞動者所從事的消費品製造產業，將淪為國際性的毀滅性競爭，長久而言，社會成員無從普遍獲益。

參、經濟全球化的勞動關係面貌：去管制為核心

將焦點擺在本文的題目：就經濟全球化對於國民國家內勞動關係之影響而言，在此將分析資本力量所通常推動的行動策略：在經濟全球化的結構性條件下，勞動關係應超往如何之方向發展，致會產生所謂的勞動人權問題？國家應採取如何之積極或消極之形成政策與措施？並不意外的，在整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實踐活動之脈絡下，基於國家與國際競爭力，如同 Wolfgang Streeck 所說，國家在內國管制結構的形成上，已相當程度的減少其「責任感與責任能力」（Verpflichtung und Verpflichtungsfähigkeit）³⁶；在勞動保護與社會安全的領域中，基於所謂「社會政策活動的邊際成本已經超越其邊際效益」、「社會國已經淪為自我毀滅的國家活動」³⁷，國家應漸次不再投入制度性的規範體系，傾向於將之留給市場機制決定，國家既減少、事實上亦漸退出有關社會重分配的規範體系。這對於內國的勞動者而言，是一不同於昔日國際化時代的關鍵差異：國家不再將勞動者視為一應予社會保護的整體，不再將之視為所應負責之秩序政策的一部分，其結果，便是學理上所說之「勞動者的分裂」（Aufspaltung der Arbeitnehmer）：隨著勞動者受僱之產業、企業、勞動或生產市場的不同，其勞動條件的差距日大³⁸。之前我們已分析過所謂產業結構之不均衡發展，在此全球化的結構性條件下，唯一得以施行整體政策以扭正此結果的國家，在此復退出它對於勞動者及勞動關係的保護及管制任務，則該不均衡發展之影響將愈趨嚴重。是以學理上在分析經濟全球化之進展時，亦有批評新自由主義之「直接將全球化等同於去管制、彈性化、民營化」的結論出現³⁹。

³⁶ Streeck,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in einer internationalisierten Wirtschaft, S. 186f.

³⁷ 德國經濟學家 Norbert Berthold 之語；dersl., Der Sozialstaat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S. 8f.。

³⁸ Streeck,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in einer internationalisierten Wirtschaft, S. 187.

³⁹ Alvater, Ort und Zeit des Politischen, S. 90; Altvater/Mahnkopf,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S. 33f.,

總的來說，針對內國勞動關係的具體形成，跨國企業資本經常採取之策略，約有下列數項⁴⁰：

- 壓迫國家政府壓低或去除勞動法與社會法上的保障或給與規定；
- 對國家政府的核心主張是：必須隨時調整國家內的規範體系、法律條文與制度（特別是團體協約、社會安全制度與教育體系），以適應全球市場的經濟及金融動態及邏輯；
- 主張國家的據點/競爭力政策（Standort- und Wettbewerbspolitik）⁴¹：壓低工資成本及勞動附隨成本，主張工時的彈性化，企業租稅的減免，勞動市場的自由化，亦即強烈主張國家間必須進行所謂的制度競爭（Institutionswettbewerb）⁴²。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跨國企業對國家政府與勞動進行如上的雙重策略，所謂福特主義時代的國家主權與資本/勞動的相對均衡權力關係，即可能遭到相當的破壞。一個更為關鍵的結構性現象是：勞動關係的存續與否，逐漸取決於一勞動者所無可置喙的全球化發展狀態 – Altvater/Mahnkopf 將之稱為「脫鉤/去鑲箱傾向」（Entbettungstendenz）⁴³ – 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傳統工業關係、特別是勞動關係本身的轉變；整理起來大致有下列幾項⁴⁴：

- (1) 勞動保護的去管制：保護勞工的法令被雙重質疑：一方面它提高勞動成本（亦即企業的經營成本），不利於企業的從事國際競爭，再者，它亦製造或惡化勞動者的失業問題 – 此無異新自由主義對於勞動市場的標準解讀 – 跨國企業全面主張法令的鬆綁，應讓勞動者有權自由協商法律最低標準以下的工資及勞動條件⁴⁵；去管制的對象例如：基本工資、解僱保護、工時的限制、團體協約制度、工會的保護法令等；
- (2) 勞動關係的彈性化：主張勞動關係的形成及內容，法律及政府不應做過多的介入干預，一切應聽任市場的機制決定，主張彈性化的對象包括勞動關

⁴⁰ 137f.。就新自由主義將去管制與全球化直接牽連的主張，亦可見 Molitor 的標準說法；dersl., Deregulierung in Europa, S. 17。

⁴¹ Altvater/Mahnkopf,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S. 319ff.

⁴² Vgl. Barthel, Die Auswirkungen der Globalisierung, S. 181ff

⁴³ 在勞動關係、特別是勞動成本的脈絡下，強烈主張必須調整勞動市場政策，以因應全球化之制度競爭的挑戰者，請見為德國聯邦政府總體經濟發展專家鑑定委員會成員之經濟學者 Siebert, Geht den Deutschen die Arbeit aus? S. 55f.。類似見解 Berthold, Der Sozialstaat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S. 34f., 73；Berthold 在此說出他的名言：「全球化的制度競爭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它使得社會國終於回到可負擔的經濟基礎之上」。

⁴⁴ Altvater/Mahnkopf,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S. 135.

⁴⁵ 紐約討論可參見 Altvater/Mahnkopf, Gewerkschaften vor der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 S. 133ff.; Röttger, Neoliberale Globalisierung und euro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S. 128。

⁴⁶ 關於工資的主要主張為：勞動者應承擔因應全球化的調整適應成本，工資應依產業別、地區別、個人技術能力別而個別協商，建立彈性化的工資結構，並且搭配使勞動力活潑移動的周邊制度，例如解僱保護的完全廢止；siehe Berthold, Der Sozialstaat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S. 12, 23。

係的形成、勞動力的支配過程、勞動關係的消滅，主要措施為：定期契約、僱用自由及部分工時契約的鬆綁、工時限制的鬆動、勞動力的隨機調整供應、解僱自由等；

- (3) 勞動的去形式化：主要就是把勞動及勞動關係，從現有國家法律、社會及經濟中的具體模型中擺脫出來，換言之，根本挑戰歐美國家統合主義時代所建立之典型勞動關係，以及以其為基礎與中介的周邊保護機制 – 包括勞動法、社會法或其他如家庭、社會生活領域中的既有模式 - ，去除法律形式上對勞動的保護，勞資關係的形成不再視為是國民國家內的階級妥協，而是拉回至企業內的控制模式⁴⁶；昔日之「核心勞工」、「典型勞動關係」，以及相對的「邊緣勞工」、「非典型勞工」，兩邊的質量關係已經面臨極大的挑戰，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勞資雙方力量關係的極度不對等，典型勞動類型正逐漸的減少與消失中，取而代之的，是問題將越來越類似部分工時勞工、身心障礙勞工、中高齡勞工等所謂問題族群勞工一樣艱難的勞動型態⁴⁷，「勞工的形式」受到資本的根本懷疑與操作，所有過去的社會保障與定型都必須受到重新的檢討。
- (4) 勞動關係的去中心化與個人化〈Dezentralisierung und Individualisierung〉⁴⁸：跨國企業主張排除工會對勞動關係形成的介入，工會被認為是一不利的制度性要素，資本傾向於由勞方作個別的勞動關係形成 – 法學上的私法自治（Privatautonomie）在此是一論述上常用的關鍵詞 - ，抗拒團體協約的規範性強制拘束力，拒絕採取勞資合作或甚至共同決定的經濟民主模式，總的來說，勞動關係的形式與內容變為企業經營策略的一部份。

在這個全球化下的企業勞動關係形成策略中，最為核心的主軸，即是 Bernd Röttger 所稱之所謂「工廠模式」（Fabrikregime）：對於勞動關係之管制行為與結構，都從國家的層次脫離，回到企業廠場的層級，此即社會學上之「從社會的管制形式到典型資本主義的管制形式」⁴⁹：重點不再是國家作為中介所建立之階級妥協 – 也就是勞動法學上所討論之社會合夥人（Sozialpartnerschaft）的相關制度⁵⁰ - ，而是回到個別勞動者與雇主的層次，換言之，回到企業場域空間內的控

⁴⁶ Vgl. Chomsky/Dieterich, Globalisierung im Cyberspace, S. 35; Streeck,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in einer internationalisierten Wirtschaft, S. 189；有關勞工「從形式到非形式」的討論，最完整者為 Altvater/Mahnkopf, Globalisierung der Unsicherheit, S. 28, 86ff., 133ff.

⁴⁷ 此即德國勞動法及工業社會學上所稱之「艱困僱傭關係」（prekäre Beschäftigung） - 例如派遣勞動、隨生產而調整之工時（KAPVOAZ）、虛假的自營工作者等，相關討論請參閱 Altvater/Mahnkopf, Gewerkschaften vor der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 S. 134。

⁴⁸ Vgl. nur Mückenberger, Arbeit 2000, S. 13.

⁴⁹ Röttger, Neoliberale Globalisierung und euro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S. 128, 130, 178.

⁵⁰ 從全球化的角度分析德國建立在社會合夥人理念之集體勞資關係的變遷，可參見 Deppe, Von der Wirtschaftsdemokratie zur Standortpflege, S. 75ff.。公法學者 Gerhard Stuby 亦針對民主理論對於社會合夥人之闡釋，分析其來自於保守之基督教社會理論（christliche Soziallehre），並以之作

制關係，學理上將之稱為所謂的「社會關係的企業管理化」（*Verbetriebswirtschaftlichung sozialer Beziehungen*）⁵¹。在集體勞動關係的層次上，全球化所帶來之結構性影響是極顯著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工業關係傳統的國家，有關此趨勢的走向將可能有所差異：只要傳統上是工會積極參與的型態，則強調所謂的去中心化（*Dezentralisierung*），工會喪失其許多昔日以集中形式主張集體勞動者利益的權能，以自願的決定模式取代義務性、強制性的決定模式（相同脈絡的是削弱罷工權的行使可能性⁵²），並賦予個別企業有較大的彈性與空間來規避集體協商之結果，逐漸使遍及整體社會範圍的社會性契約（如所謂產業地域級團體協約 *Flächentarifvertrag*）消失，或以個別廠場層級契約取代之；公共管制的僱用關係，亦轉由私人自行管制之⁵³。就勞動法學角度來看，此勞動關係去管制的主張，無異是所謂「趨近美國法」的發展傾向：國家退出其作為管制主體的角色，留任私人的協商體系，同時是「個別勞動關係」層次的協商機制與權利訂定與貫徹，來推行此「勞動關係中之去國家化」⁵⁴。

在勞動關係去管制的脈絡下，全球化時代所描述的競爭國，有一相當重要的意識工具：所謂的「就業論證」（*Arbeitsplatzargument*）。在全球化的論述脈絡下，這一意識工具尤其清晰：為改善資本的利用條件，以獲取所謂國家競爭力的優勢，民族競爭國不斷運用「失業威脅」，以壓制所有對於合理化措施或其他重組生產過程之抗拒，例如經濟性的解僱、不利於勞動者的單方變更勞動條件等⁵⁵，使以既使是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官方報告，亦多批評許多國民國家政府並非「真心解決失業問題」，而只是運用此「就業論證」來貫徹企業之要求⁵⁶。換言之，民族競爭國的勞動市場政策，似乎只有唯一的選項：就是調整配合資本利用的邏輯，壓低勞動力所生之成本 – 不論是工資成本或所謂的制度成本 – ，否則將反過來繼續惡化失業，使勞動者所依賴之勞動關係的形成與存續保障，皆失其附麗。

為社會的市場經濟之基礎，提出思想史上的發展介紹；dersl., *Bürgerliche Demokratietheorien*, S. 99。

⁵¹ etwa Röttger, *Neoliberale Globalisierung und euro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S. 174.

⁵² 針對經濟全球化時代下罷工的環境與條件之變遷，請見 Stützel (Hrsg.), *Streik im Strukturwandel* 中許多篇論文的分析，特別是 S. 65ff.

⁵³ dazu siehe Streeck,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in einer internationalisierten Wirtschaft*, S. 188.

⁵⁴ Hirsch in: dersl./Jessop/Poulantzas, *Die Zukunft des Staates*, S. 192。Scheuerman 在分析美國法之最新發展時，亦特別提到此有關德國法與美國法之趨近問題，自然是一較為負面的分析方式，例如他以 Richard Posner 的理論為例，舉出其「隱藏社會現實」與「自由市場無限上綱的保守主義」之傾向；vgl. dersl., *Die stille Revolution im amerikanischen Recht*, S. 216f.

⁵⁵ Hirsch, *Der nationale Wettbewerbsstaat*, S. 123f.; Jenner, *Die arbeitslose Gesellschaft*.

⁵⁶ ILO, *Die Beschäftigungssituation in der Welt*, S. 82.

肆、回到問題意識：全球勞動者可能共通的「人權趨勢」？

- 代結語

在我們有點繁複卻又簡略的探討有關經濟全球化之具體形貌、乃至對於勞動者可能或已經產生的巨大影響之後，或許應該回到問題的一開始：假如說，基於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與型態，不同國民國家與社會間既存在於無比重大的差距，吾人如何能得出梳理出一所謂「全球化時代下的勞動人權趨勢」呢？如果直接聚焦於現實，我們將不斷的遭逢「這裡不是這樣」、「那一個國家並沒有如此」、「何者的國民經濟尚未遭到此危機」、「結構性變遷沒有走到這裡」的許多批評與質疑，而有些，顯然是不無道理的。回到本文一開始之所謂「社會人權」的三主要面向：自由自主、基本需求、分配正義，分別配置到不同國家與社會型態中的具體時空，便可看出其相互的重大歧異：在有些地方，勞動是不自由的，是伴隨獨裁或威權之政治社會統治形式的，在其他地方，就業並未帶來勞動者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十九世紀「飢餓工資」(Hungerlöhne) 的惡夢同樣存在；而又在某些顯然較為進步的地方，前兩者的問題顯然不大，而是「社會分配」出了大警訊，貧富的差距，失業的威脅，在在都嚴厲挑戰整體社會的團結與整合能力能量。

那麼，是否真的存在一所謂全球勞動者可能共通的「勞動人權趨勢」嗎？雖然作者深刻的以為，既使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型態，不同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這些挑戰都事實上僅有程度與時間順序有別，長遠看來，基本上都可能衝擊到全世界。但想要回答如此的提問，顯然，單純的臆測與想像足夠的。本文以為，或許唯一的可能答案，是在於所謂的「社會權力關係」(gesellschaftliche Macht- und Kräfteverhältnisse) 之上⁵⁷：簡略一點的說，經濟全球化所帶來之最核心的結構性變遷，就是製造了一個實體實質與心理氛圍（例如義大利社會主義理論家 Antonio Gramsci 所說的霸權），皆獨有利於資本，卻顯然不利於勞動者暨其他弱勢族群的新權力關係，換言之，社會大多數成員透過傳統的民主政治形式，所曾經建立與捍衛的「舊民主結構」 - 不論是否為西北歐式的新統合主義 (Neokorporatismus) - ，都因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產生顯然偏頗於某一社會行動力量（「資本」）的新權力對峙狀態；本於此點，舊有的政治社會統治與控制形式，或說：舊的社會契約，都無疑的遭逢巨大的質量變。其他的具體表象，不

⁵⁷ 在政治社會學的討論中，所謂的社會權力關係分為兩者，一是「結構性的權力關係」(Machtverhältnisse)，是一種社會結構形成建構之後所客觀存在於該領域內，亦即為社會行動者之社會行動的基本框架；另一則是所謂的「結構與行動辨證影響的權力關係」(Kräfteverhältnisse)，是指在前述的結構權力關係下，基於行動者之行動的辨證式影響結構，所交互形成的另一層社會權力關係，兩者在細緻的分析上必須加以區別。當然，本文的分析基本上均包括這兩個不同的面向；類似之分析進路請參閱 Rolshausen, Macht und Herrschaft, S. 102ff. 。

論是在前述國際社會人權的何一面向：自由自主、基本生活需求、分配正義，都只是此一結構特徵的反映與呈現罷了，別無其他。

當然，一篇論文顯然不應滿足於「世界末日式」(apokalyptisch)的預言而已：假如吾人已看到如此所謂的勞動人權發展趨勢，難道只能眼睜睜的看到它的「貫穿」，日益忍受社會權力關係的一面倒，只是因為國家與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 – 例如台灣眼望第三世界國家而仍獨自慶幸著 – ，而暫有「暫時快樂、將來悲慘」的程度之別而已嗎？其實，問題還是應該回到另一根源，亦即國家理論的基本提問之上：我們究竟要追求什麼樣的「國家性」(Staatlichkeit)？或說：社會成員究竟應如何告別舊的社會契約，在經濟全球化的無比艱鉅之挑戰與衝擊下，去建立新的社會契約，找到這個國家體制的正當性？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作比較多的論述⁵⁸，在這裡或許只簡單提及一些基本概念：「舊社會契約之瓦解」，在本文所討論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及其對勞動者、乃至全體社會成員的危機脈絡下，其實是一相當清楚的現象。「全球化與世界普遍性的不平等，兩者息息相關」，幾乎是學界觀察全球化所得之共識，既使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捍衛者，也不得不承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之社會問題的嚴重性⁵⁹。換言之，如不能解決這樣的危機，先進國家的社會及國家，都會無疑的面臨崩解的危險⁶⁰。不論主張內容之歧異，進路之不同，利益角度（例如需求面或供給面、資本或勞動）如何懸殊，幾乎所有論者之焦點都一致拋向「政治」：此一最後碩果僅存的「公共性」(Öffentlichkeit) 的所在：當然，舊社會契約內涵中的「政治」，既然已經不合時宜，吾人自然應該追求新的政治形式，此即 Ulrich Beck 所說的「重新發明政治」(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⁶¹，答案或許是目前歐美社會及政治學界的熱門話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焦點不只是國民國家政府的行爲形式，也包括所有政府與內國、國際或超國際之制度、機構、非政府組織，進行合作之任何正式與非正式，在不同層級（地方、國家、國際、超國際、區域）所進行的政治關係。與昔日舊社會契約時代不同的是，人們或許不能再要求建立一普遍的、社會所共同接受的原則、理念與意識形態，而是將重心放在「決定的過程」本身（Jean-Marie Guéhenno 語）⁶²，或是像 Habermas 所說的：希望在於一個全球移

⁵⁸ 詳見林佳和，新時代的新社會契約。

⁵⁹ 既使是來自於一般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標榜經濟全球化美好的一面」的宣傳者 - 美國商業時報(Financial Times)，來自世界銀行(Worldbank)，均不諱言的同意如此之結論；siehe Brand u.a., Global Governance. Alternative zur neoliberalen Globalisierung, S. 11。

⁶⁰ 最諷刺的例子當然是國際間知名的金融炒作玩家 George Soros，連他也要寫一本「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 – 危機中的開放社會」，來「沉痛」的警惕世人了；vgl. dersl., Die Krise des globalen Kapitalismus. Offene Gesellschaft in Gefahr, Berlin, 1999。

⁶¹ 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⁶² Guéhenno, 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1994, S. 39f.

動的市民社會，以相互的溝通行爲共同形成意志與意見⁶³，亦或比較左派觀點的：企圖在社會共識的新基礎上，重新建立一符合正義要求的社會分配原則⁶⁴。無論如何，既使 Martin Albrow 所言之「告別國民國家」，乃是一正確的預估，吾人應準備迎接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與社會形式⁶⁵；然而，重點仍然在於：我們要站在政治形成的高點上，重新形成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換句話說，重新建立政治的理念，拒絕受經濟全球化邏輯的全面宰制⁶⁶。

必須在這樣的觀察至高點上，我們方能真切的看出「全球化下勞動人權」的所謂趨勢問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之社會權力關係的質變，社會多數成員的勞動者，將再難獨以個別或甚至集體之形式與力量，參與整體之社會形成，隨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經濟發展型態，在不同的時空中，它或許會展現在諸如自由自主、基本生活需求或社會分配等不同面向上，然而，如果真欲尋找一共同而貫穿的「紅線」主軸，顯然，答案就在這裡。如果不欲往吾人所不想看到的方向繼續邁進 – 赤裸的競爭、多數人的艱困、貧富的懸殊差距、社會整合的崩解、國家形式的末日 – ，那麼，正視全球化發展下的勞動人權趨勢，一個社會權力關係結構的不均衡，企圖加以重建，應該才是討論這個問題所能發揮的最大意義。

⁶³ Habermas, *Die Normalität einer Berliner Republik*, S. 185.

⁶⁴ Hirst/Thompson, *Globalisierung?* S. 90f.

⁶⁵ Albrow,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 254.

⁶⁶ Deppe/Detje, *Globalisierung und die Folgen*, S. 174f.

參考文獻

林佳和，新時代的新社會契約，第三屆和平學研討會論文，2003 年 10 月 23/24 日，台北：東吳大學

Albrow: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Globalen Zeitalter*, Ffm. 1998

Altvater: Ort und Zeit des Politischen unter den Bedingungen ökonomischer Globalisierung, in: D. Messner(Hrsg.), *Die Zukunft des Staates und der Politik*, Bonn 1998, S. 74ff.

Altvater/Mahnkopf: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Münster 1993

- : Gewerkschaften vor der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 Tarifpolitik nach Mauer und Maastricht, Münster 1993

- : Globalisierung der Unsicherheit. Arbeit im Schatten, Schmutziges Geld und informelle Politik, Münster, 2002

Amin: *Die Zukunft des Weltsystems. Herausforderung der Globalisierung*, Hamburg 1997

Barthel: Die Auswirkungen der Globalisierung auf den Standort Deutschland, in: Eckart/Paraskewopoulos(Hrsg.), *Der Wirtschaftsstandort Deutschland*, Berlin 1997, S. 181ff.

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Ffm. 1993.

- : *Was ist Globalisierung? Irrtümer des Globalismus – Antworten auf Globalisierung*, 1 Aufl., Ffm. 1997

Berthold: *Der Sozialstaat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Tübingen 1997

Böckenförde: 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 NJW 1974, 1529ff.

- :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Ffm. 1976

Brand u.a.: *Global Governance. Alternative zur neoliberalen Globalisierung*, Münster, 2000

Chomsky/Dieterich: *Globalisierung im Cyberspace*, Bonn 1996

Deppe: Von der Wirtschaftsdemokratie zur Standortpflege. Der Preis der neuen Sozialpartnerschaft, in: Dreßler/Negt/Wolter(Hrsg.), *Jenseits falscher Sachzwänge. Streiten für eine zukunftsfähige Politik*, Hamburg 1998, S. 75ff.

Demirović: Die Transformation des Wohlfahrtsstaats und der Diskurs des Nationalismus, in: Bruch/Krebs(Hrsg.), *Unternehmen Globus. Facetten nachfordistischer Regulation*, Münster 1996, S. 89ff.

- Demirović/Krebs/Sablowski*: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ß, Münster 1992
- Deppe/Detje*, Globalisierung und die Folgen. Gewerkschaften unter falschen Sachzwängen, in: Bischoff/Deppe/Kisker(Hrsg.), Das Ende des Neoliberalismus? Hamburg 1998, S. 154ff.
- Germann/Rürup/Setzer*: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Begriff, Bereiche, Indikatoren, in: Steger(Hrsg.),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Konsequenz für Arbeit, Technik und Umwelt, Berlin-Heidelberg 1996, S. 18ff.
- Giddens*: Konsequenz der Moderne, Ffm. 1996
- Gosepath/Lohmann*(Hg.): Philosophie der Menschrechte, Ffm. 1998
- Guéhenno*: 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1994
- Habermas*: Die Normalität einer Berliner Republik, Ffm. 1995
- Heilbronner*: Wirtschaftliche Probleme einer post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 in: Kern (Hrsg.), Probleme der post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Königstein/TS. 1984, S. 218ff.
- Hirsch*: Der nationale Wettbewerbsstaat. Staat, Demokratie und Politik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2 Aufl., Berlin 1996
- Hirsch/Jessop/Poulantzas*: Die Zukunft des Staates. Denationalisierung, Internationalisierung, Renationalisierung, Hamburg 2001
- Hirst/Thompson*: Globalisierung?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Nationalökonomien und die Formierung von Handelsblöcken, in: Beck(Hrsg.),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fm. 1998, S. 85ff.
- Holloway*: Reform des Staates: Globales Kapital und nationaler Staat, PROKLA 1993, 12ff.
- Jenner*: Die arbeitslose Gesellschaft, Münster 1996
- Jessop*: Regulation und Politik. Integrale Ökonomie und integraler Staat, in: Demirović/Krebs/Sablowski(Hrsg.),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ß, Münster 1992, S. 232ff.
- Junne*: Internationalisierung und Arbeitslosigkeit. Interne Kosten des „Modell Deutschland“, Leviathan 1979, 57ff.
- Kohler-Koch*: Politische Unverträglichkeiten von Globalisierung, in: Steger(Hrsg.),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Konsequenz für Arbeit, Technik und Umwelt, Berlin-Heidelberg 1996, S. 83ff.
- Krugman*: Wettbewerbsfähigkeit. Eine gefährliche Wahnsinnvorstellung, JB Arbeit und

Technik 1996, 37ff.

- : Der Mythos vom globalen Wirtschaftskrieg. Eine Abrechnung mit den Pop-Ökonomen, 2 Aufl., Ffm., 1999

LE Monde diplomatique(Hg.): Atlas der Globalisierung, Berlin 2003

Lipietz: Nach dem Ende des Goldenen Zeitalters. Regulation und Transformation kapitalistischer Gesellschaften, Berlin-Hamburg 1998

Lompe: Neue Dimensionen politischer Macht aufgrund ökonomischer Positionen – Signalisiert die Globalisierung das Ende demokratisch legitimierter Politik? in: Henkel/Neumann/Romahn (Hrsg.), Gegen den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Imperialismus der reinen Ökonomie, Marburg 1998, S. 153ff.

Misik: Mythos Weltmarkt. Vom Elend des Neoliberalismus, 1 Aufl., Berlin 1997

Molitor: Deregulierung in Europa, Tübingen 1996

Mückenberger: Arbeit 2000 - Überlegungen zu einer Neugestaltung der Arbeitsverhältnisse, in: Redaktion KJ(Hrsg.), Arbeit 2000. Arbeitsrechtliche Reformvorschläge auf dem Prüfstand, Baden-Baden 1996, S. 13ff.

Narr/Schubert: Weltökonomie. Die Misere der Politik, Ffm. 1994

Ritzer: Die McDonald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Ffm. 1997

Röttger: Neoliberale Globalisierung und euro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1 Aufl., Münster 1997

Rolshausen: Macht und Herrschaft, Münster 1997

Scheuerman: Die stille Revolution im amerikanischen Recht, in: Brunkhorst/Niesen(Hrsg.), Das Recht der Republik, Ffm. 1999, S. 209ff.

Siebert: Geht den Deutschen die Arbeit aus? Wege zu mehr Beschäftigung, München 1995

Stober: Zur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s Demokratie- und Sozialstaatsprinzips, GewArch 1988, 145ff.

Streeck: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in einer internationalisierten Wirtschaft, in: Beck(Hrsg.),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fm. 1998, S. 169ff.

Stuby: Bürgerliche Demokratietheorien in der BR, in: Kühnl (Hrsg.), Der bürgerliche Staat der Gegenwart,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 S. 87ff.